

秦义春◎编著

人类社会自古就是以群落为单元的，而每个单元都有自己的生存方式和文化内涵及其历史传承。虽然有些群落为社会的最底层，不为主流社会所认可，但他们仍按自身的方式存在着、发展着，并绵延几千年，创造了自己的历史和文化，并使其成为中华五千年历史的丰富和文化补充。正所谓“高处不胜寒，低处纳百川”，其中的文化意蕴令人玩味反思。

古代社会群落文化丛书

镖行

丛书主编◎康保成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卷之四

...

行

...

...

镖行

【古代社会群落文化丛书】

秦义春

编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镖行 / 秦义春编著. —北京: 中国社会出版社, 2009. 11
(古代社会群落文化丛书)

ISBN 978 - 7 - 5087 - 2881 - 0

I. 镖… II. 秦… III. 保镖—研究—中国—古代 IV.
D691.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189693 号

丛 书 名: 古代社会群落文化丛书

丛书主编: 康保成

执行主编: 李跃忠

书 名: 镖 行

编 著: 秦义春

策划编辑: 李军伟

责任编辑: 李军伟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出版社 邮政编码: 100032

通联方法: 北京市西城区二龙路甲 33 号新龙大厦

电 话: (010) 66080300 (010) 66083600

(010) 66085300 (010) 66063678

邮购部: (010) 66060275 电 传: (010) 66051713

网 址: www.shcbs.com.cn

经 销: 各地新华书店

印刷装订: 中国电影出版社印刷厂

开 本: 170mm × 240mm 1/16

印 张: 12.25

字 数: 200 千字

版 次: 2010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0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28.00 元

《古代社会群落文化丛书》编委会

丛书主编 康保成

执行主编 李跃忠

编委 李跃忠 李鸿渊

李山林 周榆华

周永忠 郑劭荣

张冬莱

序

人类社会自古就是以群落为单元的，而每个单元都有自己的生存方式和文化内涵及其历史传承。虽然有些群落为社会的最底层，不为主流社会所认可，但他们仍按自身的方式存在着、发展着，并绵延几千年，创造了自己的历史和文化，并使其成为中华五千年历史的丰富和文化补充。正所谓“高处不胜寒，低处纳百川”，其中的文化令人玩味反思。

目前在我国图书市场还没有一套自成体系的“群落”文化丛书，因而，根据其特点我们提出了一个全新的概念，即社会群落文化。旨在从文化的视角全新解读古代社会群落文化内涵，并力图填补我国非主流文化的空白。

中国人群的划分，最早是从商周开始的，士农工商的定位一直延续了数千年，这是社会人群的主流。但在此之外，还有许多以其他职业为生的群体，他们也许人数不多，但对社会的影响却是极大的。其中有些群落，如侠客，以除暴安良为己任，是社会的稳定因素；而像流氓土匪这种群落则增加了社会的混乱和动荡；伶楼艺人在旧时代大多包含辛酸，身世之悲令人一掬同情之泪；而在今天，他们却成为社会文化的代言人，成为人们追捧的艺术家。因此，无论从哪个角度讲，了解过去对于今天的人们来说都是必要的。社会人物虽然形形色色，但万变不离其宗，了解过去，也是为了知道今天，预见未来。

编 者

前言

镖行是缘票号而生，理由是“镖者，金票也”。保镖就是保金票。

镖局和票号的关系，确实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首先是镖局和票号均是封建社会内商品经济高度发展的产物；其次是镖局和票号都是属于封建经济范畴，都是在“新政”的冲击下由鼎盛急转直下归于衰落；再次是镖局、票号和清王朝均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而且二者是相关企业。

一提起票号，人们立即会联系到晋商。中国两大商帮有南徽北晋之说，而且从经济实力上来讲，晋商要超过徽商。因为晋商控制着票号，在经济领域中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可是山西在明清两朝均不是经济、文化发达的地区，于省份来说称得上是贫穷之地，自然经济居主导地位，商品经济很不发达。明朝万历时实行“一条鞭法”，山西未能推行；清朝雍正时推行“摊丁入亩”，山西执行时阻力也很大。原因很简单，商品经济不发达，老百姓生产出来的农副产品，一时难以变成银两去交纳田赋。但晋商为何有如此雄厚的经济实力，创造出了富甲天下的山西票号？要弄清这个问题，要上溯到明朝初年。

明初设“九边”以防御蒙元的残余势力南下，防卫的重点就在山西地区。当时山西布政使的辖区还包括现在的河北、内蒙古、陕西的许多地区。沿边的军事重镇如章化、大同、东胜、榆林、太原、延绥……或设于山西境内，或临近山西省区。所以山西就成了明廷对付蒙元残存势力南下的战略后方和补给基地，出现了许多军需承包商，这些大小承包商都发了“军财”。

民族关系缓和下来后，明廷又开了“茶马互市”和沿边少数民族进行贸易以通有无。名为“茶马互市”，其实贸易的范围很是广泛，盐、布、绸以及百货之属无所不易。晋商利用地利之便垄断“茶马互市”，从法律形式上来说“茶马互市”是官营，可是山西商帮也成了互市的承包商。

万历之后明王朝的防卫重心已转向了山海关外，山西失去了军事重镇的地位。但是此时的晋商羽翼已丰，积累了雄厚的资金，已有虎视黄河两岸、大江南北之势。位于大运河汇入长江的水衢扬州是中国南北商帮的会

聚之所，晋商、徽商均“择扬州而居，以窥天下之利”。二者虽然同居一城，但仍然保留着自己的传统和特色。晋商善于聚财、守财，经营上比较保守重信，生活上也比较有所节制；徽商在经营上比较灵活，生活上好大肆挥霍。

晋商发祥于承包军需和茶马互市，和朝廷有传统的联系，好走上层路线。晋商南下北归均沿京杭大运河，所以北京是其中转基地。在扬州“窥天下之利”，在北京“窥天下之势”，“挟利势而无敌于天下”。

综上所述，晋商这个概念不是活动在山西地区的商人，而是山西籍的商人。许多地区的会馆称之为山陕会馆，从广义上来讲，晋商这个概念还包括部分陕西商人。许多晋商在经商地区已经生活了许多代，但仍然保留山西省籍，其原因是山西商帮的势力大、招牌响，可做依托。

晋商足迹遍布全国，为了保障自己生命财产的安全，当然要寻求保护。不但要寻求官方和半官方的地方势力的保护，也要进行自卫。商人进行武装自卫，可以说是伴随着商业活动的产生而产生的，但自卫的形式有多种。康熙初期，隐居在陕西华阴县的顾炎武致书在山西的傅山，商议以护商为名建立武装力量以谋反清复明的大业。有的学者以此为依据认为镖行缘起于山西，并推论镖行和票号同根同源，得出了“鏢者金票也”的结论。

镖行的产生并不排除多元论，更不排除镖行与票号有一种内在的联系。但保镖作为一个行业来说它是独立的，绝不是任何行业的附庸或其中的一部分。因为保镖和被保护对象不是一种简单的雇佣关系，而是一种对等的合同关系。“丢鏢”时鏢局要按合同进行赔偿，订立合同的双方有明确的权利和义务。

北京会友鏢局的鏢师们师徒口碑相传，该鏢局创建于康熙年间。即使是口碑无讹，鏢行的产生也只能是在康熙末年，或是康雍之际。因为在此以前不存在鏢行产生的条件。

票号的产生可溯源到唐代“奏事院”的“飞钱”，但有文字可考，也得到各界人士公认的说法却是雏形产生于乾隆时期。第一家见诸记载的票号日升昌是嘉庆年间（约1824）在山西平遥诞生的，该店前身是染料庄。在乾嘉以前可以说并不存在产生票号的条件，因为封建社会内商品经济的发展冲垮了国家对主要商品的垄断专卖制度是鏢行、票号产生和兴盛的前提条件，而真正具备了这种条件的时间应该说是乾嘉之际。

大型鏢局的鏢路覆盖大半个中国，在主要城市均设有分号和外柜；大型票号的分支机构不但遍布全国，而且打出国门，在大阪、神户、新加坡

等地设有分号，俨然有国际化的趋势。可是二者对外的经营方式、对内的管理方式都是封建性质的。

镖行和票号有业务关系，可以说是相关企业。镖局不但为票号护院、坐店，还为票号运送银两。票号之所以用“逢百抽五”的高额费用请镖局运送银两，是因为镖局一旦“丢”了“镖银”，将按合同照价赔偿。如果镖局是票号的附庸或是票号的组成部分，那么票号也就失去了请镖局运送银两的意义。

有的票号研究专著上认为“票号兴而镖局衰”，从表面上来看确是如此。庚子之后票号进入了鼎盛时期，而镖局却一蹶不振了。但镖局一蹶不振的原因绝不是票号兴，只能说是票号鼎盛也并不能挽救镖局的衰落，何况票号由鼎盛到败落也不过是八九年的时间。

票号在清咸丰朝度过了第一个黄金时代。太平天国攻下镇江后切断了京杭大运河，清廷不但漕运中断，而且江南各省的饷银也难以解送到京，此时票号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利用民间渠道为清廷提供金融服务，几乎成了“国家银行”。此时镖局也发了票号的财，正常情况下运送银两“逢百抽五”，在兵荒马乱的动荡时期绝非此数，价码多少，视路途、“匪情”而定。

清廷为了解决财政危机，在道咸以后大肆卖官，四品的京卿、道员之下直至监生（相当于秀才）皆可用银子来“捐”。票号包揽这项买卖，用银子打通了由中央到地方的大小关节，俨然成了吏部的分支机构。

八国联军攻占北京后，慈禧、光绪“西狩长安”，户部银库成了联军的“战利品”，清王朝没有了国家银行，此时完全失去了财政来源。在这种非常情况下，只好再度依靠票号。票号此时也全力以赴支持清廷度过了财政危机，所以庚子以后票号鼎盛。

辛丑条约签订后，帝国主义国家开设的汇丰（英国）、花旗（美国）、道胜（俄国）、正金（日本）等银行在中国的大中城市普遍设立了分支机构。1905年后，清廷推行“新政”，也开始设立大清银行、大清邮政等新式的金融、邮电机构，各省也设立了“省行”或“官银号”，为地方官办的金融机构。当国家和地方的官营金融机构建立起来并发挥实体效用后，票号也就此一蹶不振，纷纷倒闭了。所以票号由鼎盛到全面衰落只用了七八年的时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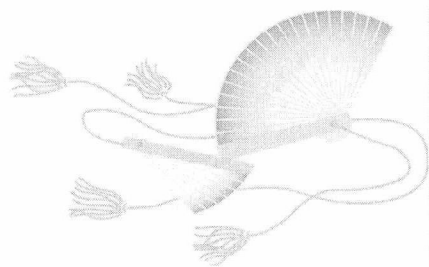
镖局的全盛时代是“同治中兴”时期，从时间上来说不但早于票号而且长于票号。辛丑条约签订后镖局一蹶不振，二十年之后以会友镖局的关闭标志着中国传统镖行的瓦解。可是票号不但在辛丑之后“红火”了七八

年，而且有的票号苦苦撑持到 20 世纪 40 年代的抗战时期。

综上所述，镖局和票号只是相关企业，而且不是同步相关，但镖局和票号在对外的经营方面、对内的管理方面、对社会的交际方面都有许多相似之处。造成这种相似之处的原因是镖局和票号产生的时代背景相同，二者都是封建社会内商品经济高度发展的产物，又都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畸形成长起来的，在成长的道路上，和清廷上上下下的官僚体系都有千丝万缕的关系，所以二者有许多相似之处。

镖局和票号有很深的业务联系，可是这种联系并未造成二者之间兴衰与共。但二者的兴衰均和清王朝的政治局势有直接关系。镖局和票号之间的关系是否只限于产生的时代背景相同、成长的时期大体一致，以及业务上镖局为票号运送银两、护院、坐店还值得进一步探讨，保镖就是保金票说也还需要进行更深入研究。一些研究票号的学者把票号本身拥有的武装自卫力量和镖行混一而谈是有些欠妥的。镖行是由镖局、镖户、个体镖师所组成的一种行业，镖行和被保护对象之间的关系不是简单的自由雇佣和受雇之间的关系。镖行的主体部分镖局已经把这种自由雇佣和受雇之间的关系上升为权利和义务分明的商业合同关系，丢镖后照价赔偿正是对等的商业合同关系的集中反映，也是保镖做为一个行业而独立存在的具体标志。镖行的独立性不但在研究镖局和票号的关系时要给予充分的注意，在区分镖师和警卫、家丁、团丁、打手……时也应给予充分的注意，不要把绅、商、黑社会直接拥有的武装力量和镖行混一而谈。

目录



第一章 镖缘水起 / 001

第二章 江湖“大公司”——镖行 / 011

- ❖ 镖行与土匪的关系 / 013
- ❖ 镖行的江湖斗争艺术 / 019
- ❖ 镖行行规 / 024
- ❖ 镖行的武器 / 02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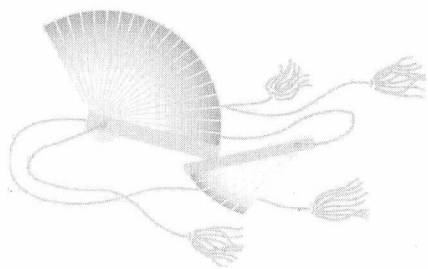
镖
行

第三章 镖行中的“小企业”——镖户 / 033

第四章 镖行“冠统”——镖局 / 039

- ❖ 镖局经营的业务范围 / 049
- ❖ 北京八大镖局联军形成的
前因后果 / 055
- ❖ 镖局的千里走会 / 059





❖ 镖局的解饷 / 064

❖ 镖局的运输工具 / 067

❖ 镖局的“宠物” / 073

 镖鸽 / 073

 镖犬 / 074

 蝓蝓 / 076

❖ 蒙古道上的镖局 / 077

❖ 镖局与北京“嘎杂子” / 084

❖ 镖局与绑票匪徒 / 090

❖ 史上著名镖局 / 110

 兴隆镖局 / 110

 会友镖局 / 111

 成兴镖局 / 112

 玉永镖局 / 113

 广盛镖局 / 11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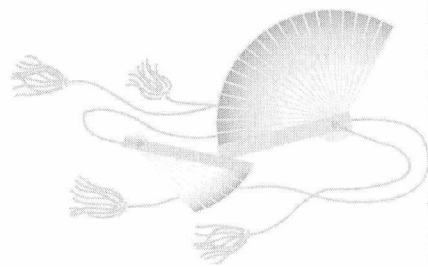
 同兴公镖局 / 115

 顺源镖局 / 115

 三合镖局 / 116

 万通镖局 / 117





第五章 镖局“个体户”——镖师 / 119

- ❖ 镖师的生涯 / 129
- ❖ 镖师的德行 / 136
- ❖ 镖师的武功 / 144
- ❖ 巾 帽 镖 师 / 152
- ❖ 史上著名镖师 / 157
 - 镖师豪杰大刀王五 / 157
 - 广盛镖局戴二闯 / 164
 - 铁腿无敌左二把 / 166
 - 双刀镖师李风岗 / 167
 - 形意宗师车永宏 / 167
 - 华北面王王正清 / 168
 - 单刀镖师李存义 / 170
 - 技精艺全李尧臣 / 170

镖行

第六章 镖界逸事 / 17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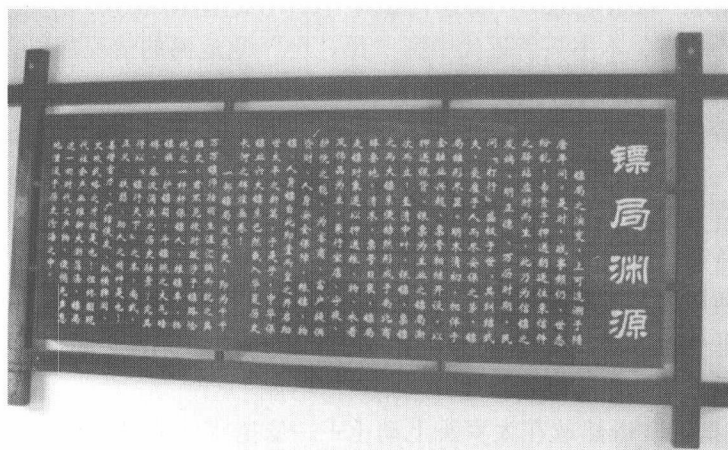


第一章

鏢緣水起



北京是京杭大运河的终点码头，运河对北京地区的发展起到了重大的作用。隋炀帝把以洛阳为中心的运河北上开通到涿郡（北京）的目的主要是为了东征高丽的军事需要。当时涿郡是辽东前线的后勤补给基地和朝廷的前进指挥所。元、明、清三代是以北京为首都的统一王朝，大运河是连接京师和经济发达的江南地区的交通大动脉，其功效是综合性的，体现在经济、军事、政治、文化诸多方面。清代平定三藩之后，南方各省局势稳定，长城之外亦无“边患”，运河的功效在经济上突出了起来。清廷维护运河畅通的直接目的是确保南粮北调，解决北京地区十余万携眷驻防的八旗官兵的口粮和朝廷命官的俸米。



由于京杭大运河横穿海河、黄河、淮河、长江、钱塘江五大水系和直隶、山东、江苏、浙江四大省区，在航管上、运输上有许多复杂的技术问题和跨越省区的河政问题，所以清代设河道总督综理黄河、运河事务，官阶为正二品，并例兼兵部侍郎和右副督御史銜。河道总督额定三缺，北河由直隶总督兼任；南河由漕运总督兼任；东河为专任。河道总督直辖的军队名曰“河标”。本标有左中右三营，分防驻守的部队有八营。河道总督衙门之下辖有“管河道衙门”，直隶、河南、山东、江苏四省的河政官员总计有同知 22 人、通判 13 人、州同 5 人、州判 13 人、县丞 37 人、主簿 42 人、巡检 11 人，河政机构之庞大可想而知。由于漕运问题是跨越省区的复杂问题，所以清代设有总漕部院衙门，简称漕运总督衙门，主管漕政。漕运总督驻节淮安，管辖山东、河南、江苏、安徽、江西、浙江、湖北、湖南八省漕政，并节制八省卫（守备）、所（千总）官兵，官阶为正

二品（加尚书衔者为从一品），因例兼兵部侍郎、督察院右副都御史衔，所以全称为总漕部院衙门。漕运总督直辖的部队称为“漕标”，本标有左中右三营，分防的城守、水师部队有七营，驻守运河沿岸要冲之地。在运河沿线还设巡漕御史，分驻淮安、济宁、天津、通州四镇巡视漕务，稽查漕政。巡漕御史是钦差官（监察官）直接向皇帝述职。

由于清代的河政、漕政独立于地方行政之外，所以大运河两岸具有特殊的地位，在政治、经济、文化、风尚诸多方面都有其特殊性。大运河流经河北、山东、江苏、浙江四省，全长1800余华里，两岸途经的地区又是人烟稠密、经济发达地区，所以造成的影响也甚为巨大。中国有句俗话，“靠山吃山，靠水吃水”。靠运河就吃运河。吃运河的人，士、农、工、商，各界均有，本书只就近代中国“黑社会”吃运河的情况加以介绍，因为“黑社会”的存在和发展与鏢行的存在和发展是密切相关的。

在清代，运河两岸的黑社会团伙通称为“吃漕的”。吃漕的方式“非偷即抢”，“偷不到就抢”，“偷时被发现就夺”。总之是以偷为主，抢为辅。从官方来讲，“吃漕的”自有漕标官兵进行镇压，偷者锁拿送县，交地方官治罪；抢者格杀勿论。可是官船（运粮船）上的船丁和押船的官兵对运河两岸的骚扰也已经足以构成一害。为害方式是白天穿着号坎（官衣）为非做歹，晚间官船照例停航，船丁和押船官兵脱下官衣或偷或抢，作案之后只要跑回运粮船，地方官则奈何不得。

“吃漕的”既然敢在太岁头上动土——偷抢官船，对于航行在运河之上的民船更不会轻易地放过。从历史上来看，人类最早的暴力行为——抢劫行为比交易活动产生的更早。因为交易活动只能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的水平、有了剩余产品时才可能产生部落之间的交易行为。而在此以前，原始人为了争夺生存空间，原始群落之间、部落之间即有暴力行动，而且早期的交易活动，经常伴随着抢掠行为。“神农氏日中为市，聚天下之民，交易而退”。为何非等到“日中”才“为市”呢？其主要原因是光天化日之下便于管理和控制，防止发生暴力行动。早期的西方殖民主义者到达中国广东、福建沿海地区时也是“交易”和“抢掠”相结合，在有驻军守卫，或地方势力控制下的武装力量十分强大的地区，有些西方“客人”则以商人的面貌出现，在没有防卫力量的地区从事海盗式的抢掠。所以官方、非官方、合法、非法的商业活动都存在着“保卫”问题。国家专卖、垄断形式下的官营贸易，自有国家机器进行有效的保卫。非法商业活动中的与官方对抗行动，以及“黑吃黑”的互相火并的行动，是伴随着非法商